

## “文艺与灾难”专栏:“海外视野中的抗战文学”专题研究

# 《远山淡影》中的战争创伤书写与代际差异<sup>\*</sup>

郑亚捷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远山淡影》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处女作,故事以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寡居英籍日裔女性悦子的回忆为主要内容,叙述在英国现实生活和日本战后回忆间交织穿插推进,将长崎的战争记忆假托在佐知子身上,通过大量散落在对话中的信息逐渐剥离出故事的“真相”,集中展示了战后日本民众的心理创伤和疗愈困境。石黑一雄以独特的双重身份和残缺记忆叙述为写作策略,从三代人代际差异的角度探寻不同创伤类型及受创原因,分析文化创伤、家庭创伤及心理创伤的内涵与症结,再现主流战争历史记叙和个体创伤记忆之间的差异,并探讨受创者内心深处的恐惧、痛苦和震动情绪对被创者余生带来的负面影响。该作品以跨文化视角对日本的文化与战争责任进行了反思,并以微观视角下的个人心理反思世界视野内“战争与和平”的宏大话题。

**关键词:**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战争创伤;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 I0-03;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19)05-0135-06

**DOI:** 10.13715/j.cnki.jxupss.2019.05.022

英籍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英国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与 V. S. 奈保尔、拉什迪一起享有“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称号。石黑一雄的英日双重文化背景使他兼擅书写战争文化与跨文化种族题材,他的作品比较集中地涉及了战争创伤、记忆、怀旧、流亡、跨文化理解等主题。2017年石黑一雄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褒奖他的创作“揭示出人类充满激情的力量,以及面对晦暗不明的世界的痛苦”。<sup>[1]</sup> 20世纪的一百年中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无辜的民众被卷入了可怕的战争,因此,通过文学书写来再现“见证者”“幸存者”眼中战争的“外在真实”和“内在真实”,逐渐形成了国际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景观。石黑一雄的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跨文化的视角,他以一种想象和再造战争受害者的方式来反思二战中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的处女作,小说以战后长崎为背景,整体基调悲伤凝重,在对话中或隐或现地重现了战争给一个普通家庭的三代人带来的难以弥合和疗愈的创伤。目前学界有王飞、赖艳、何卫华、李厥云、周颖及魏文等

学者对该作品有专门研究,研究论点主要集中在历史创伤、族裔身份、双线叙事、跨文化视角、战争反思及日本想象等话题,本文则侧重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日本战后老年人绪方先生、中年女主人公悦子(佐知子)及其幼女景子(万里子)共三代个体的文化创伤、家庭创伤和儿童心理创伤的不同内涵和症候。

石黑一雄的写作“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发现了我们与世界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对人心的把握尤为精准,波澜不惊的叙述表象下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弗洛伊德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sup>[2]</sup><sup>223</sup> 小说着重表现饱受战争摧残的平民战后生活中的心理“创伤”、“扭曲”、“变异”,也即战争亲历者的战后心理综合症,其中弥漫着一种孤独、压抑、不安和悲痛的气氛,“展现了战败后日本社会个体生命的挣扎与民族共同体挥之不去的内心阴影。”<sup>[3]</sup><sup>514</sup> 战争创伤并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它

<sup>\*</sup> 收稿日期: 2019-03-28

作者简介: 郑亚捷(1977—),女,甘肃临洮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16SKGC-QG05)

的影响是迟滞的、延宕的、反复的抑或是致命的。

《远山淡影》以移居英国的悦子多年后回忆自杀身亡的大女儿景子为主线,她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些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事情可能不是我记得的这个样子。”<sup>[4]46</sup>“回忆,我发现,可能是不可靠的东西;常常被你回忆时的环境所大大地扭曲,毫无疑问,我现在在这里的某些回忆就是这样。”<sup>[4]201</sup>不可靠的“记忆书写”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更大的弹性空间,带来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相互矛盾的解读效果。“回忆”是主要叙述视角,“人物对话”则是主要写作策略,小说通篇以平淡克制的对话来展开故事内容,叙述非常琐碎和细腻,在细碎的对话与回忆中,读者能缓慢地捕捉到一些关键信息,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疑团和空缺。“无序中达成平衡,这一直是石黑一雄的风格,故而,读者从他小说中所获得的快乐,既源自小说张力、冲突和碎片的交织,也源自小说达成的平衡。”<sup>[5]113</sup>这种叙述方式所呈现的战后日本民众的个体记忆和战争创伤,它与多数人印象里的公共记忆是不一致的,也形成对抗性,这种书写则有利于读者通过个人视角来反思战争、展望和平。

### 一、价值的坚守与失落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中多数战争文学都致力于思考战争态度及性质,激烈的战场和英勇的战士被极力渲染并被统摄到宏大的民族神话之中,是经典的民族主义叙事。战败后的日本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的压制,国际处境尴尬,这迫使日本民族开始反思战争话题。相当多的日本本土作家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承认战争错误,也不能客观反省自身,但另一些日本作家从生命、人性、死亡、真实等角度在文学中进行了战争反思,“书写的是战争,关切的是和平”,<sup>[6]110-111</sup>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军国主义造成的核灾难有著名言论“人为雷击,可以归于上帝;人为核弹所杀,只能归于自己。”<sup>[7]7</sup>石黑一雄认为“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或不能承认这些错误,才是最丢脸的事”<sup>[8]158</sup>。这一观点展现了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并对战后日本的战争态度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石黑一雄始终站在人类文明与和平的高度来审视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责任。战争失序引发的伦理失落和价值冲突带给年长者的普遍困惑始终是他重点聚焦的内容。

《远山淡影》中的绪方先生退休前曾经担任长崎秀一中学的校长,他深受传统日本文化影响,是传统

伦理及精神的坚守者与传承者,战前系日本政府的忠实拥护者。“日本近代国学中的‘日本精神’原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皇室而产生的君民一家、君国一体’的民族精神。”<sup>[9]124</sup>这一精神倡导“从日本古典中挖掘日本的固有精神,激励日本国民,促进社会改革。”<sup>[9]124</sup>在绪方的理解中“纪律、忠诚,从前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sup>[4]79</sup>在日本社会中这种精神对团结国民、凝聚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共识曾经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利用这一精神获取了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绪方在谈及战争责任时说:“我们打败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枪和坦克,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胆小,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浮浅。”<sup>[4]189</sup>绪方难以认同和接受战后日本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以自由、民主、和平、人权为核心思想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潮。他认为这一思潮带有很强的政治主义色彩,是美国占领军的舶来品,并不属于日本传统。这一变化激起老一辈人的民族主义感情,绪方更将批判矛头直指美国人:“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他们的做法也许很适合美国人,可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很不一样。”<sup>[4]79</sup>绪方先生否定民主,崇尚“忠诚”“纪律”“义务”。

“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地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学校里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现在的孩子离开学校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尽全力教导这个国家。很多好东西都毁了。”<sup>[4]79-81</sup>

在战后日本的特定文化氛围中,年轻人对美国文化的崇拜和接纳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景观,日本的文化传统遭受冲击、断裂和流失的大势难以阻止。绪方的失落和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显得愤激又无力“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sup>[4]79</sup>“现在的妻子都忘记了对家庭的忠诚。……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sup>[4]79</sup>作为一名曾经的教育工作者他重申对日本传统价值拥护和坚守的义务“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前的日本有一种精神把大家团结在一起。”<sup>[4]80</sup>但令绪方感到悲哀的是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无法说服,二郎反驳父亲说“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旧的教育体系里也有一些缺点,其他体系也是。”<sup>[4]79-80</sup>“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什么损失。”<sup>[4]80</sup>青年一代仰慕西方文明,产生新的生活意识,对生活观念的容忍度增大,对此绪方哀叹道“真遗

憾。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日本发生了太多事情让年轻人动摇。”<sup>[4]71</sup>战后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日本的青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西方人的生活理念、服饰饮食、流行文化等物质文明范式尤甚,物质主义化倾向有取代日本东方式精神文化的趋势,但是这些在绪方等老一辈的眼里基本是享乐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写照。曾经日本军国主义者用谎言愚民、控制民众并美化侵略战争,蒙骗无数青年失去生命。战后觉醒的青年逐渐认识到这种欺骗,开始日益厌倦压抑、疲劳和紧张的生活,不再唯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至上。面对社会中新文化个性的涌现和青年的“反叛”,老一辈人盲目抗拒西方价值潮流被证明是徒劳的,战后日本社会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与西方主流价值接触和碰撞的道路。

绪方发现曾经的学生松田重夫在《新教育文摘》杂志上撰写文章批评当年校领导,他愤怒地找上门与他理论,重夫不仅否定了当年绪方及校方灌输给年轻人的“爱国”教育,还毫不留情地说那是“可怕的东西”,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sup>[4]188</sup>年轻一代独立思考和干预政治生活的倾向越发清晰,代际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得老一辈人心情失落,这种价值观的尖锐对立更加凸显战后日本社会价值流变之剧烈。世易时移,今非昔比,“战后初期,曾经被军国主义政府禁止的日本共产党重新公开活动,很快组织了大规模左翼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青年政治行动。”<sup>[10]43</sup>左翼青年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中日益上升,曾经被日本民众尊崇为无上权威的国家象征天皇不再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传统的力量之源,战败的尴尬事实使得日本文化及种族优越的信仰逐渐破灭。

小说通篇蕴含着时代和价值的“变”与“不变”,“变”字着重展示战后日本民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小说多角度地体现了老年一代面对新价值观的失落,与其说这是绪方对年轻人的不满,毋宁说这是作者借此表达了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基于二战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并战败的事实,无论老一辈们曾经如何拥护政府和国家,抨击所谓的文明侵蚀了传统的美好,无奈昔日的神话都已破灭,他们一无所获,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对于曾经誓死保卫国家为伦理道德准则的国民,当他们得知这是毫无意义的作为时,那种说不出的内心悲哀就油然而生了。”<sup>[11]28</sup>面对战后截然不同的现实处境,老一辈饱受内心的焦虑和煎熬,国家命运与个人价

值之间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历史错位,甚至可以说“创伤性”是内在于老一辈传统日本人精神结构里的荒诞事实。

## 二、故国的逃离与遥忆

《远山淡影》主要由移居英国的日裔寡妇悦子围绕“负罪感”进行“回顾性”、“分析性”的叙述。悦子刚经历了丧女之痛,她孤独地寡居于英国乡村,过着一种“置身事外”的“安静”生活,并伴随着一种“孤悬世外”和“隔离”的感觉。大女儿景子(与前夫二郎所生纯日本血统女儿)的自杀带给她深深的创痛,成了她余生难以直面的梦魇。小女儿妮基(与英国丈夫所生混血女儿)前来探望,母女俩的对话打开了“记忆迷宫”的大门,故事从回忆景子的自杀场景开始:

“……听到她自杀的消息时,第一个在我脑海闪现的念头……他们发现她之前她那样吊着多久了……后来,验尸官说她那样吊着好几天了……”<sup>[4]64</sup>

“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了。”<sup>[4]64</sup>

透过这段死亡沉思看得出悦子与女儿之间既亲密又疏离的亲情,丧女的悲痛事实终激发了她对移民生活的反思与审视,她一边努力宽慰着自己,又悔恨自己的抉择毁了女儿的生活和生命。作为一个带着满身创伤背井离乡的逃亡者、离散者,移民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异国生活与她的想象并不一致。现实中的异国生活仅“安静”二字便道出了她孤独而空虚的生活本相,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石黑一雄擅长族裔题材,他总是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寻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共识。悦子为了摆脱战争阴影而远走他乡,但是身份转换又带来文化融入和认同的焦虑,多年在英国生活使她深刻体会到东西文化之间无解的隔膜与偏见“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sup>[4]4</sup>她们母女始终是新环境里的“异国人”,文化认同和族群融入是个难题,努力融入并不会引发个体的自动归属感。亲人(丈夫和大女儿)离去之后,尤其是大女儿景子自杀的事实使她原先的初衷荡涤无存。悦子时常陷入到景子自杀的噩梦中,英国乡村中大而空荡的房间和先前东京伯父家里的大屋子相比,面临的困境仿佛是相似的——内心的虚空和孤独无处安放。英国乡村生活表象美丽、宁静,却无法掩盖悦子悠长内心深处的恐惧、混乱、空虚和痛苦,异国生活中的新创伤和隔膜使得她依然是深陷困境“永远不得安宁”,就像是“茶壶里的风暴”。悦子一度还动

了要卖房并离开的念头,与当年她决绝地离开日本移居国外相对比,前后的变化可谓耐人寻味。“石黑一雄将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移民话语身份的困惑并置于历史事件的变革语境,而新的身份认同则成为移民个体必须踏上的新天路历程并将融入其他文化传统促进身份叙事的展演,并借用戏仿文本的他者化视角使悦子坦然面对她曾经的过失和对长女的忏悔,而角色的转换则使创伤叙事成为疗慰现实困境的心理防御机制,将故事的复调结构转化为滑稽的互文图式。”<sup>[12] 47</sup>

文学正日渐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国际文化载体”,成为沟通不同地区、族裔、文化及代际间共同经验的媒介。小说中在家庭里文化层面的隔膜和冲突依旧无法避免,英国继父对景子的偏见和歧视也是造成她自杀悲剧的原因之一。悦子说“虽然我的丈夫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的文化,更不理解二郎这人。”<sup>[4] 114</sup>“虽然他从未直说出来,但是他会暗示说景子从她爸爸那里继承了这种性格。”<sup>[4] 119</sup>妮基短暂的五天探访中,日本母亲与混血女儿间的谈话常常陷入僵局,母女之间也有着深刻的文化鸿沟,交流的艰难客观上加剧了悦子内心的焦虑,这导致孤独的悦子又开始沉湎于回忆日本往事。妮基问“你还常常想日本吗,妈妈?”悦子答“我想是的,我会回忆一些往事。”<sup>[4] 237</sup>故土它给予人们归宿感,是人的精神指向,是所有人的根底所在。正如绪方所说:“一个人也许会在一个地方工作、奉献,到了最后,他仍旧想回到他生长的故乡去。”<sup>[4] 192</sup>石黑一雄在一次访谈中讨论自己的父母“我认为我父母并未获得一种移民思维(Mentality of immigrant)而常常就像游客一样,保持着自己的‘日本性’(Janpaneseness)。”<sup>[13] 92</sup>虽然逃避是悦子的基本生活姿态,但是逃离故土并非创伤治愈的最终解决之道,最终异乡的孤独反而映衬出原乡的温暖。

丧女之痛是悦子心头难以承受的重,“《远山淡影》通过复调形式下的多个声部,含蓄地揭露了忏悔背后的谎言,既表现了作家对战争受创群体的理解与同情,又不乏对其展开道德薄弱面的冷静审视。”<sup>[14] 21</sup>因此作者创造了悦子的“影子人物”(double)佐知子,发生在日本长崎的生活全部假托佐知子来回叙。小说的重要细节几乎都隐匿在不动声色的对话中,作者把灾难和毁灭等大起大落的情感都包裹在了克制、精准和优雅、有序的对话里,它传达给读者的是阅读的平衡美感。

故事叙述中多处展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两重复调式的表述加强了意义传递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形成了一种“多音色”的阅读效果。佐知子始终将出国动机表述为是为了女儿万里子的未来,“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sup>[4] 115</sup>“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sup>[4] 220</sup>“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女儿的幸福。这是我优先考虑的。”<sup>[4] 108</sup>回忆的写作策略让佐知子充当了责任的承担者,在后续的叙事推进中,也同时暴露出了她曾是个“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的事实,她是一个烦躁、易怒、不负责任、任性的母亲,在道德上具有其薄弱性。在西方视角下她是个勇敢追求幸福和自由的女性,但是东方视角下她是一个自私、不称职并缺乏耐心的母亲。小说中处境艰难的佐知子为了实现出国梦想而忽视母亲责任,并多次将女儿置于无人看管的处境,与美国大兵弗兰克在尴尬的、不对等的关系中约会,毫无讨价还价之力。弗兰克是个猥琐寡情的酒鬼且多次不辞而别,明知自己被无情戏弄,仍然锲而不舍地、无比卑微和耐心地维持失衡的恋情。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东方民族的自卑情结使得西方男子被“白马骑士”化。佐知子寄望于弗兰克能带她们母女俩出国,她曾无比卑微地说:

“人要有耐心,悦子,一旦他到了美国,他就能找到工作,寄钱来……我不介意多等一些时间。”<sup>[4] 219</sup>

国家战败产生的幻灭感和幼年时期来自父亲的影响,都促使佐知子萌发强烈的出国愿望,想前往西方文明国家生活,这也是战后日本疲惫绝望的“深广的心理奔溃状态”。佐知子去意已决“离开这个地方(长崎)我是多么如释重负,”<sup>[4] 212</sup>佐知子的记忆里隐含着移居异国的真相,与其将她解读为是对女儿勇敢负起责任的母亲,毋宁说是她抛离故土和羡慕异国幸福生活的结果。在思想保守的邻里那里她是被众人津津乐道、闲言碎语的对象;在敏感的女儿眼里,她是个令女儿感到尴尬的母亲。从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规避行为是佐知子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佐知子的目的是为了逃避眼前深为厌倦的生活,但却在自我表述中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东方式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她始终在积极逃避战后的灾难性生活,这是她逃离故土的最主要动机。但文本隐在的分裂叙述中,“遥忆”往事和“死亡”事件使得这种自我矛盾表述的可靠性消失殆尽。

“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式的个体精神本能的压抑状态,提升为对社会文明层面意识形态的批判,并

称此类单向度的社会个体为“物”的奴隶,而东方主义者对殖民地他者的压制并取代本土文化认同的过程,则将其置于边缘化的境地。”<sup>[12]47</sup>佐知子(悦子)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边缘到中心的身份逆转,她为了弃绝自己的东方身份,也牺牲了自己的女儿,最终的结果是带着故土创伤又新添了身份危机。

### 三、童年的梦魇和宿命

文学批评界的解读共识即小说中的万里子“可以被视为是景子的,而景子则是到了国外之后的万里子。”<sup>[15]</sup>景子的童年故事由悦子断续回忆,假托“影子人物”万里子之名讲述出来。

战争是残忍、可怕和触目惊心的,战时万里子经历了恐怖的创伤性事件:约五六岁时,她在东京的小巷子里亲眼目睹了一个失智的女人在水边溺死了自己的孩子。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受创者偶尔会出现创伤性情境的“重演性”发作,恍如再度身临险境,出现错觉、幻觉、意识分离性障碍等,时常发生“触景生情”式的精神痛苦,这种经验和现象所产生的结果称之为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头脑中不时闪回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不可逆转。溺子的场景带给童年万里子极度的恐惧感受。这一创伤性事件形成万里子一生难以逃脱的梦魇记忆,她时常对“另一个女人”产生神秘幻觉,黑暗中她幻觉到河对面一个女人向她发出邀约,对此她充满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佐知子明明知悉病况“那个女人”并不是万里子“发难时的小把戏”、不是“编出来的”,而是真有其人,但佐知子却无能为力,她选择了淡化、逃避,甚至无视万里子的病况,她寄望于时间的自然疗愈,“我以为她长大以后就会好了,可是最近又开始了。”<sup>[4]93</sup>童年创伤经验对万里子造成了不可逆的终身伤害,惊悚的溺婴情境在万里子的思维和记忆中萦绕出现,无法控制并影响到了她的生活。

在万里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被验证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伤害,她持续受其烦扰,创伤的“延迟性”和“反复性”也导致了她的怪异行为模式升级。“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接受充分爱的人,将来必是人格健全、能爱人、有独立感、责任心的自我实现型人物。”<sup>[16]134</sup>童年缺爱并受伤的万里子,生活状态的孤独令人感到痛惜和怜悯。邻居眼里童年时期的万里子留着“短短的头发”、“像个男孩”、“没有笑容”、“打架”、甚至“和男孩子打架”、“逃学”、“整天自己一个人呆着”。<sup>[4]12-13</sup>生活孤寂的她性格怪异孤僻,日渐木然、淡漠,与人疏远、不亲切、害怕陌生人,不愿意与人有交流。万里子缺乏正常的渠道宣泄不良

的情感,她感到焦虑、自卑和孤独,无法接受他人,始终有种紧张感潜藏于她的心灵深处。

童年生活经历将决定个体的一生,“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经验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认为个人生活的不幸可以在其过去的经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经验中寻找根源,即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究其病因,往往都可追溯到童年时的环境和教育因素。”<sup>[16]134</sup>万里子跟随母亲长期过着迁徙流浪的生活,内心深处极度渴望稳定温馨的家庭,这种心理需求也投射在一系列细节中。因为母亲佐知子“艰难”而又“似是而非”的异国恋情,万里子遭到了小朋友的嘲笑和攻击,令她感到十分羞耻。万里子嫌弃并厌恶母亲的交往对象弗兰克,她骂道“弗兰克像猪一样撒尿。他是臭水沟里的猪。”<sup>[4]107</sup>内心深处极度排斥他。佐知子和万里子发生冲突的焦点是“是否移民异国”的问题,这既是母女间的代际冲突,也可以引申为东西文化冲突。最终还是由母亲决定并规划家庭的走向,当万里子表明想带心爱的猫咪一起时,处境艰难的单身母亲佐知子便再无耐心了:

“看不出除了这些肮脏的小东西以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只是……只是动物,你看不出来吗?”<sup>[4]213</sup>“这些小东西在顽抗……(溺死小猫)”<sup>[4]217</sup>

佐知子溺猫的举动几乎激怒了万里子,这个场景勾起了她幼年的创伤性情境记忆,形成了深重的伤害,不仅毁了万里子对生活的最后一丝希望,也令她彻底失去了对家人的兴趣。日后的事实证明出国前佐知子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女儿根本无法适应异国的新生活。

“在她最终离开我们的前两三年,景子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不是和妮基吵架,就是和我丈夫吵架,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sup>[4]63-64</sup>

带着童年的创伤,景子的生活中处处有着紊乱和激越的行为,有脱离家人的倾向,创伤的经验是无法遗忘的,逃避也不意味着创伤能够就此恢复。景子跟随母亲移居异国之后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她的房间是她在异国生活的一个缩影——孤独、隔绝、封闭,景子和继父与胞妹的关系都很紧张,她甚至拒绝出席继父的葬礼。拒绝融入的生活态度最终导致毁灭的宿命。“战争创伤后遗症”给受创主体景子(万里子)留下无尽痛苦,她陷入到一种无法想象和控制的生活情境中去,心灵破碎的她再也

无法达到人生的平衡。

### 结语

《远山淡影》以战后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记忆空间和叙述对象;从精神、心理、记忆和命运等角度展开创伤叙事,以同情的视角展现了劫后余生的日子里民众如何依然艰难向前?作者有意识地克服可能的偏狭视角,从人类高度来审视这场灾难,表达了对核战争灾难中受伤人们的关切。石黑一雄得奖后对媒体说“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作家,我这么认为。”<sup>[17]</sup>他虽然身处西方文明的中心,但他个体上却坚持着多元视角,作者的族裔出身和西方视角决定了他的书写是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是全球性的。张爱玲曾说“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sup>[18]52</sup>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与战争的结合为人类带来了严重灾难,同时也潜藏着更多未知危机。如果能够合理运用现代科技将会造福人类,反之则会带来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石黑一雄身处异乡但又回望原乡,他的写作是基于人性高度与视角下的战争反思和文明思考,他致力于对普遍人性作出文学表达与思考。“假如说他的作品筛去了历史的残渣,探入灵魂的层面,它同样也向我们广义理解的文明,向随着文明而来的道德与社会价值致以敬意。”<sup>[5]113</sup>在文学中“回顾性创造”一种“虚构的日本”<sup>[19]79-81</sup>形象和进行“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是石黑一雄文学写作的世界意义与价值。

### 参考文献:

- [1]路艳霞. 诺奖得主石黑一雄中译本全部出齐 [N]. 北京日报, 2018-09-25.
- [2][奥]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M]. 高觉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李文庭. 论《远山淡影》中的战争书写 [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 [4][英]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M] 张晓意,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1(4).
- [5][英]本·霍华德. 彬彬之言: 石黑一雄的声音 [J]. 周颖, 译. 世界文学, 2018(2).
- [6]李德纯. 战后日本文学史论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7]柳鸣九. 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 [8][英]石黑一雄. 浮世画家 [M]. 马爱农,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1.
- [9]胡铁生. 战争与和平的当代文学反思——以英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为例 [J]. 求是学刊, 2018(2).
- [10]刘杰. 战后日本青年文化述评 [J]. 青年研究, 1992(7).
- [11]钱有钰. 日本二战题材电影透视 [J]. 电影新作, 2005(5).
- [12]李厥云. 论《远山淡影》的创伤记忆和身份叙事 [J]. 长春大学学报, 2017(11).
- [13]Brian W. Shaffer, Cynthia F. Wong. Conversations with Kazuo Ishiguro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8.
- [14]陈莹. 战争创伤帝国挽歌记忆母题——论石黑一雄对战后失序的道德思考 [J]. 外国文学动态, 2018(1).
- [15]周颖. 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 [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14.
- [16]林菁. 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对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 [17]石黑一雄得了诺奖, 日本人为什么反而更担忧? [EB/OL]. 2017-10-7. 虎嗅网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17216.html>
- [18]张爱玲. 烬余录 [M] // 流言.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 [19][英]石黑一雄, [美]陈圣为. 我心底的日本 [J]. 世界文学, 2018(2).

责任编辑: 万莲姣

## War Trauma Writing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A Pale View of Hills*

ZHENG Ya - 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A Pale View of Hills* is Japanese-born British writer Kazuo Ishiguro's first novel which is mainly formed by reminiscence of Japanese-born female Yuezi who experienced the pain of the loss of her daughter and the loneliness of living in British countryside. The narrative weaves between British reality and Japanese post-war memories. Nagasaki War memories manifests through Sachiko. The "truth" of the story is gradually stripped out by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scattered in the dialogue. The stor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healing difficultie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fter the War. With unique double identity and incomplete memory narrative strategy Kazuo Ishiguro ascertained different types of trauma and damaged reasons, analyzed cultural trauma, family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war history narrative an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raumatic memories, and explored the inner fear, pain,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rest life from the angle of difference of three gener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work reflects on Japan's culture and war responsibility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reflects on the grand topic of "war and peace" in the world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A Pale View of Hills*; war trauma;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